责编：泓佐 E-mail:ccps6235@163.com Tel:010—62806235

◆战略视角

2013：中东四大焦点呈现新态势

□高祖贵

2013年，中东大变局持续深入演化。突尼斯、利比亚、也门等发生政权更替的国家继续艰难转型，沙特、阿联酋、约旦等寻求变革的国家潜在风险继续酝积，伊拉克安全局势继续恶化，土耳其埃尔多安政府执政遭遇挑战。在此背景下，四大焦点问题演进新态势尤显突出。

埃及局势：穆尔西政府被军方废黜，国家转型陷入曲折

埃及这一轮政治转型进程始于 2011 年 2 月，当时 30 多个党派组成的改革派力量（后来组成“全国拯救阵线”）、“穆斯林兄弟会”（后来组建“自由与正义党”）和“萨拉菲派”（代表为“光明党”）等主要政治力量，加上以改善民生为诉求的劳工和农民等广大中下层民众，在追求“自由、正义、民生、就业”的旗号下，共同要求穆巴拉克下台，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所代表的军方选择站到民众一边，迫使穆巴拉克下台。之后，“穆兄会”支持的“自由和正义党”和“光明党”等共 47 个党派构成的“民主联盟”，经选举成为议会上下两院第一大政治力量，它们推举的候选人穆尔西当选为总统。埃及由此开启从威权政治向选举政治转变的历史进程。其间，伊斯兰主义力量、埃及军方和“全国拯救阵线”代表的改革派力量之间围绕政治权力展开激烈角逐。2012 年 6 月，穆尔西总统所代表的伊斯兰主义力量凭借多数民众的支持，不顾军方的反对，坚决推出新宪法草案，并在全民公投中赢得多数人的支持。新宪法草案颠覆了此前军方所提出的强化“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地位的宪法修正案，不允许军方对议会决议拥有否决权，不允许军方享有凌驾于民选政府之上的权力，使得军方的权力和利益受到明显挤压。新宪法草案通过之后，穆尔西总统更换了“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主要领导人，由塞西接替坦塔维出任国防部长，迫使军方妥协让步，初步实现了伊斯兰主义掌控政权的目标。

然而，经过穆尔西总统一年的执政，埃及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形势的发展使得其他政治派别的不满大幅上升。在政治上，穆尔西总统改组内阁，强化“穆斯林兄弟会”及其本人的主导地位。这使得改革派担心宗教势力对埃及政治和社会文化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甚至向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方向发展。与改革派的担心相反，比“穆斯林兄弟会”更为保守的“萨拉菲派”则认为，穆尔西总统至今没有使“沙里亚法”（伊斯兰教法）在埃及得以施行，同样感到越来越不满。军方领导人把穆尔西总统强化对军队的掌控视为威胁，感到过去“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掌控国防部的局面正在发生改变，担心军方在埃及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利益进一步受损。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穆尔西总统领导下的政府未能改变穆巴拉克下台前后面临的经济社会发展困难局面，使得埃及经济社会发展多项经济指标继续持续恶化趋势。在对外关系上，尽管穆尔西政府继续与以色列保持和平，对美国保持友好，但其积极改善与伊朗的关系，强化对非政府组织尤其是与西方国家有密切联系的非政府组织的关系，使得国内改革派和西方国家对埃及的政治和外交走向担忧上升。

在此情况下，穆尔西政府逐步陷入孤立。2013 年 7 月 3 日，军方利用各派权力分化斗争带来的机会，以及部分政治势力和民众希望军方出面稳定政局的期待，罢黜穆尔西总统。之后，“穆兄会”注册的非政府组织被取缔，其领导人被捕，“挺穆”民众与军方之间、“挺穆”民众与“倒穆”民众之间陷于长时间大规模对抗和冲突。军方力图按照其提出的政治路线图，先组建过渡政府，然后于 2014 年 1 月进行全民公投，年中将举行议会和总统选举。埃及转型进程由此陷入新的博弈重组。

叙利亚危机：转向寻求政治解决，局势酝酿拐点

叙利亚危机从 2011 年初的街头抗议快速演化为全面内战。2012 年，政府和反对派的武装对抗陷入僵持。2013 年，危机开始经历重大变化。上半年，反对派经过多次整合，力量不断壮大，在战场上与政府形成分庭抗礼之势。下半年，政府军调整战术，借助来自黎巴嫩和伊朗的支持，在战场上逐步占据优势。8 月的化武事件发生后，美国奥巴马政府认定这是叙利亚巴沙尔政府所为，宣布要进行惩戒性的有限的军事打击。但随后俄罗斯提出叙利亚交出化学武器换取美国停止军事打击的方案，得到叙利亚和美国赞同。叙利亚巴沙尔政府于 10 月 14 日正式签署联合国《禁止化学武器条约》，并开始依照安理会通过的关于叙利亚化武问题的第 2118 号决议，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合作，开始消除化武。根据安理会决议要求，叙利亚任何一方都不得使用、开发、生产、获取、储存、保留或转让化学武器，要在 2014 年上半年完成对所有化学武器物料和设备的销毁。目前，这项工作进展比较顺利。由此，叙利亚危机从一度即将爆发的外部军事干预，转变为政府、反对派（包括叙利亚境内外的，主要为温和力量）、伊斯兰激进主义势力（从世界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涌入并不断壮大）三方混战的复杂状态。在三方的较量中，政府优势扩大，反对派收到削弱，激进主义势力扩大。这种态势一方面促使沙特、卡塔尔等国积极寻求在美欧之外，加大对它们信任的叙利亚国内反对派力量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促使美国、俄罗斯以及联合国—阿盟特使卜拉希米等各方加紧斡旋，推动于 2014 年 1 月在日内瓦召开国际会议，为政治解决这场危机寻找方案。目前，会议能否如期举行和结果如何取决于巴沙尔是否参加会谈和是否参加 2014 年大选的抉择，反对派能否整合成相对统一的立场，沙特、伊朗、土耳其等区域力量之间以及美俄之间的博弈。

伊朗核问题：实现历史性突破，前景走在明暗之间

2009 年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在基本延续小布什政府有关伊核问题的“大棒加胡萝卜”的双轨政策框架的同时，从小布什政府偏重使用“大棒”调整为“大棒”和“胡萝卜”并重，在明确划出对实施军事打击的“红线”（即伊朗决定制造核武器和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之后，更加强调使用政治、经济、外交手段，对伊朗全方位施压，包括：在秘密战线加紧进行“暗战”，加大情报搜集和渗透力度，实施网络攻击以迟滞伊朗核技术开发进程；持续加强对伊朗与核技术开发项目相关的个人、机构、公司和金融机构，以及其他国家有关联的公司和金融机构的经济制裁力度，通过经济和外交施压等多种手段促使其他国家一起减少从伊朗的石油进口；加大对以色列的军事支持力度，不断推进与海合会国家的军事安全合作；不断推动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美、英、法、俄、中）加上德国与伊朗围绕其开发核技术的问题展开谈判（即 5+1+1 机制）；对伊朗国内社会发展施加影响，为其民主变革力量提供帮助。受此影响，伊朗的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困难不断加重，石油收入每天减少 1.33 亿美元左右（年度损失近 450 亿~500 亿美元），通货膨胀率一度高达 40%，汽油产品等价格上涨，首都德黑兰的房价上涨了 3 倍，里亚尔对美元的贬值甚至超过 70%，进口大幅减少迫使政府转而扩大国内生产以满足民众需求。但是，伊朗并未因此寻求妥协，而是通过加快研制导弹和无人机、频繁军演等加强军事防卫能力，增加核技术开发设施，威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和对以色列及美国在中东的利益目标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同时又保持战略克制，继续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保持接触并表示愿意与美、英、法、俄、中、德等六国就核问题继续进行谈判等。伊朗的这些应对措施使得奥巴马政府以压促变目标实现的可能性下降，加上伊朗在叙利亚危机和伊拉克安全局势等问题上的影响上升，这使美国国内主张采取强硬政策的呼声上升，奥巴马政府在伊朗问题上实现某种突破的紧迫感增加。

这种形势发展，为双方在下半年出现的新互动提供了动力。2013 年 8 月，经过总统选举正式上台执政的伊朗总统鲁哈尼为了发展经济，不断通过给奥巴马总统写信、公开讲话以及在美国《华盛顿邮报》等主流媒体发表文章，释放愿意在核开发等一系列问题上调整政策，与美国等寻求改善关系的信号。美国奥巴马政府随即顺势做出积极反应，表示如果伊朗新政府选择实质性地和认真地履行自己的国际义务，寻找和平解决问题的办法，那么美国将是其真诚的合作伙伴。这为有关伊朗核问题的谈判实现突破创造了契机。2013 年 11 月 24 日，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美俄英法）加上德国与伊朗经过艰苦谈判，达成历史性的第一阶段协议。根据该协议，在 6 个月之内，伊朗停止纯度 5% 以上的铀浓缩，已有的 5%以上的浓缩铀以稀释等方式“处理”，以防用于制造核武器；伊朗不得扩建或新建铀浓缩设施，可用于提取核武器材料钚的阿拉克重水反应堆停止建设；伊朗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进入更多设施。相应地，伊核问题六国不再对伊追加制裁，暂停对伊贵金属、汽车零部件和石化制品的禁运，允许少量伊朗石油出口，解冻伊朗留学生资金，放宽对伊食品和药品进口限制。2014 年 1 月 13 日，有关各方在日内瓦就落实该协议达成一致意见，从 1 月 20 日开始执行该决议。这使得伊核问题朝着政治外交解决方向迈出了重要步伐，之后能否继续推进取决于美伊各自内部不同政治力量的博弈以及其他利益攸关方的互动。

以巴和谈：进程重启，实质性重大突破可能性增大

巴以冲突是二战以来中东持续时间最久和矛盾最复杂的问题。2009 年，奥巴马政府上台不久，就在埃及开罗大学发表讲话，表示要帮助推动解决巴以问题。然而，2010 年年底从突尼斯开始并迅速蔓延至埃及、利比亚并席卷整个地区的地区大变局，不仅迫使奥巴马政府转而应对变局而无法继续推动巴以和平进程，而且使得以色列安全环境恶化和巴勒斯坦“哈马斯”地位提高，特别是使得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与美国奥巴马政府之间的分歧大幅上升，加上奥巴马政府对外战略的注意力开始向亚太转移，这些因素综合作用导致美国推动巴以和谈的动力减弱和难度上升，巴以关系紧张，和平进程陷入停滞。2013 年以来，在美国总统奥巴马第二任期首访就到达以色列的推动下，内塔尼亚总理明确表示愿意做出历史性妥协，同意巴勒斯坦人民建立一个与以色列为邻的非军事化国家。民调显示半数以上以色列人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巴勒斯坦方面相应表示，赞同阿拉伯国家联盟提出的新倡议。美国国务卿克里更是连续 9 次出访斡旋，力促巴以双方在 9 个月期限内（2014 年 4 月左右）达成和平协议。

在美国的积极推动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于 2013 年 7 月 29 日在华盛顿重启直接谈判。经过 10 余轮的秘密谈判，克里于 2013 年 12 月 15 日宣布，巴以和谈取得实质性进展，但具体内容保密，预计双方将在 2014 年 4 月前达成协议。紧随其后，欧盟外长会议 12 月 16 日就明确承诺，如果巴以双方达成一份最终协议，就向双方提供史无前例的援助，包括与双方建立特惠伙伴关系，向双方提供对欧洲市场更多的进入权、更紧密的文化和科学联系、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以及加强政治对话和安全合作等。同时，欧盟警告以色列，不要宣布新的定居点计划，否则和谈失败的后果将由以方承担。12 月 17—26 日，中国外长王毅出访巴勒斯坦、以色列、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沙特五国，核心任务就是落实习近平主席在 5 月提出的有关解决巴以冲突的四点主张，为和谈进程取得突破作出中国的贡献。2014 年元旦，美国国务卿克里第 10 次访问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提议双方就最终和平协议的框架大纲进行讨论，涉及以巴未来国界、安全力量部署、巴勒斯坦难民安置等重大问题，以便在 2014 年 4 月底完成和谈，但没有取得结果。但从目前情况看，巴以和谈要取得重大突破，仍需美欧和阿拉伯国家等有关各方的积极推动，尤其是巴以双方领导人的艰难抉择。

◆环球瞭望

参拜靖国神社是对和平与正义的挑战

□刘建飞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供奉着甲级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引起多国爱好和平人民和政府的强烈谴责和抗议。参拜绝不是日本的内政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国际问题。而作为国际问题，参拜也不仅仅是影响中日关系和中韩关系的事情，而是涉及亚洲乃至世界和平的大是大非问题。

毫无疑问，参拜行为极大地伤害了当年受日本军国主义蹂躏的各国人民的感情。日本军国主义者当年对东亚各国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爱好和平的东亚各国，本着宽容精神，在战后接受日本作为一个改过自新的国家回到国际社会，但前提是日本民族真诚地悔过自新。然而，近些年，日本右翼却不断在历史问题上大做文章，否认甚至美化侵略历史，而且这种行为又得不到有效的制止，让爱好和平的东亚人民愤慨。

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如此。东亚人民重视日本的历史问题，更为重要的深层次原因是，他们担心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历史很可能有战略意图。冷战结束后，日本右翼极力鼓动日本应该加快成为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步伐，进而称霸东亚，为此就应该让日本从战败国的阴影中走出来，成为一个“正常国家”。走出战败国阴影的途径就是否认并美化侵略历史。这种战略意图对维护东亚的和平与稳定是非常危险的。历史表明，一个民族在某一特定历史阶段，在政治家们的误导下，会走入歧途。二战以前的德国和日本就是如此。

无可否认，任何一个民族的普通百姓都是爱好和平的，因为战争的最大受害者就是他们。德国和日本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一样，也是爱好和平的。但是，在两国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势力的蛊惑、欺骗之下，善良的人民却把政权交给了这些极端的、邪恶的势力，任由他们对内搞专制暴政，对外侵略扩张。从这个角度讲，德国和日本人民对两国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罪行也负有间接的责任。对这一点，二战后的德国政治家们都有清醒的认识。也许正是因为这样，在德国就没有类似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这样荒谬的事情发生。如果德国政治人物敢于参拜纳粹分子的灵位（如果有的话），不仅欧洲人民不会答应，德国人民更不会答应。

当初，德日两国军国主义势力用以蛊惑民众的思想武器主要是两个：一个是种族优越论；一个是生存空间论。对德国来说，还有一件武器，就是在历史问题上做文章。战后的《凡尔赛和约》对德国进行了严厉惩罚，使德意志民族遭受屈辱，引起德国民众的不满。纳粹军国主义势力为了骗取人民的支持，进而夺取政权，就利用民众的不满情绪，鼓动打破凡尔赛体系，煽动德国人民的民族复仇情绪，诱导民众支持德国对外扩张。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可以洞见，今天的日本右翼势力正在玩这三张牌。否定历史，实际上就是肯定当年日本军国主义所宣扬的“大和民族优越论”；同时也是在对国民进行错误历史观的教育，使国民忘记日本的战争责任，甚至将日本打扮成战争的受害者。如果战争受害者观念在日本社会树立起来了，下一步就很可能导致民族复仇主义出笼。近年来，日本同中、韩等国在领土、海洋权益上的纠纷，大有争夺生存空间的味道。按说，日本提出的某些领土和海洋权益要求，都缺少国际法依据，但是日本右翼和部分政客却对之大肆炒作，让人联想到二战前德国和日本的做法。日本右翼是不是想重祭“生存空间论”这面大旗，用以误导日本民众，以获取民众的支持？右翼势力正在为军国主义招魂，并让其附在自己的肉体上。

和平与民主是当今世界的两大潮流，也是世界绝大多数人民和国家所尊奉的价值观。然而，日本右翼的行为恰恰是在挑战这两个价值观。首先，否认历史本身，就是在挑战和平。当年亚洲和美欧许多国家团结起来，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些国家的人民都坚信他们的行为是正义的。就拿美国来说，美国人民坚信：太平洋战争是日本挑起的，美国奋起反击，是出于自卫；美国与盟国一道同日本作战，是打击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这些极端、邪恶势力的正义之举。而日本右翼否认历史，很显然是在挑战包括美国在内的抗日国家人民的历史观，是在挑战世界人民为之付出了巨大牺牲的世界和平事业。其次，否认历史也是对民主价值观的挑战。现在，人们似乎只是关注日本军国主义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实际上，日本军国主义还是反对民主、大行专制的一股恶势力。日本在明治维新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也开始孕育，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日本出现了政党政治等民主因素。然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却用极其残暴、卑劣的手段，将主张民主的政治家们一个一个地从肉体上消灭，将民主政治扼杀在摇篮之中，从而为他们掌握政权，实行专制独裁扫清道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双手不仅沾满了亚洲爱好和平人民的鲜血，也沾满了日本爱好民主人士的鲜血。可是，今天的日本右翼却将供奉着军国主义分子、甲级战犯（他们既反和平又反民主）灵位的靖国神社视为圣地，以对之进行参拜为荣，很值得世人深思和警醒。

针对日本右翼势力挑战和平与民主、伤害亚洲国家人民感情的行为，世界正义力量应当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应当旗帜鲜明地反对、谴责、抗议。这种反和平、反民主的行为，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将贻害无穷。

研发与创新：西班牙破解债务危机之道

□孙 波

西班牙自 2008 年以来，一直深陷欧债危机之中。这场危机的深层原因是经济结构性失衡，具体表现在产业结构失衡、劳动市场失衡、公共预算失衡、金融扩张失衡等诸多方面。2011 年拉霍伊上台执政以来，政府有针对性地推出各种改革举措，经济总体呈现复苏迹象。

西班牙经济正在温和复苏

2013 年前 8 个月，西班牙金融账户余额 367.97 亿欧元，2012 年同期逆差 2541.09 亿欧元。外国直接投资较去年同期增长 2 倍；证券投资逆差依然存在，但已由 2012 年的 1050 亿欧元降至 2013 年的 111.2 亿欧元；其他外国投资逆差也由 1237 亿欧元减少至 109 亿欧元。贸易逆差减少 64%，为 84.2 亿欧元。对外出口额 1557.98 亿欧元，较 2012 年同期增长 6.6%，进口额 1642.18 亿欧元，同比下降 3.2%。西班牙国家统计局 2013 年 10 月份发布数据，三季度失业人数减少 7.28 万人，失业率降至 25.98%。三季度 GDP 环比增长 0.1%，标志着经济走出持续 9 个季度的衰退期。

2013 年 9 月，拉霍伊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表示，西班牙已走出衰退，但在全面复苏和恢复就业之前，仍面临很长一段时间的经济紧缩和痛苦的调整时期。西班牙 BBVA 银行在 2013 年 11 月份发布的“西班牙形势”报告中指出，西班牙经济正在温和复苏。2013 年四季度 GDP 将增长 0.3%，2013 年 GDP 同比下降 1.3%，同时预测 2014 年西班牙经济增长将达 0.9%，高于欧委会 0.5%的增长预期。BBVA 首席经济学家拉斐尔·多梅内克表示，西班牙经济目前处于“复苏之初”，明年的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出口的拉动和金融压力的减小，明年失业率也将停止增长。

2013 年 12 月，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提升了对西班牙主权信用评级的展望，由原先的“负面”调整为“稳定”。此前，标准普尔也已于 2013 年 11 月底将西班牙的主权信用评级展望由“负面”调整至“稳定”。

研发与创新是提振经济的良药

西班牙是传统的科技大国。因为受到经济危机的严重影响，西班牙近年来的研发投入持续削减。据西班牙国家统计局（INE）公布的统计数据，自 2010 年，西班牙科技研发投入比 2009 年略有下降后，2012 年研发投入持续削减，从 2011 年的 85.86 亿欧元减少到 64.39 亿欧元，削减近 25.5%。但即便如此，西班牙的经济与竞争力部近年来仍有 142 亿欧元投资于研发和创新领域，在研发方面的官方投资已经接近于欧洲平均水平。西班牙还多方吸纳研发资金，2013 年 5 月 17 日，欧洲投资银行（EIB）宣布优惠贷款 2 亿欧元资助西班牙雷普索尔（Repsol）石油集团的 2013—2016 年期研发创新计划（RDI）。

得益于政策支撑和资金扶持，西班牙的科研机构近年来陆续推出了一系列具有重大影响的研发项目。比如，西班牙国立远程教育大学研发的胡萝卜生物燃料技术，西班牙巴尔那切瑞斯生物技术公司研发的鱼用口服疫苗，马德里卡洛斯三世大学和格拉纳达大学开发的语音情绪识别系统，西班牙瓦伦西亚的研发的新型声学隐身装置，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理工大学开发出的新型生物混凝土，西班牙圣塞瓦斯蒂安电化学技术中心开发的世界上第一个自我修复的聚合物——新款“自愈热固性弹性体”，西班牙塑料技术研究所研发出的 100%可生物降解的塑料瓶，西班牙兵器公司研发的可以在 100 米空中飞行的“牧羊人”新型无人侦察机，等等。

西班牙的研发与创新体系

从概念到市场。西班牙在科技创新研究方面的战略和计划中，有一整套“从概念到市场”的指导理念和操作机制。首先，是聚焦全球范围内的研发资源，制订全球人才吸引计划，网罗科学和创新人才；其次，是打造有利于研发和创新的环境；再次，是通过对创新型企业的政策支持，以及时刻追踪未来技术的发展，保持技术和创业方面的领先地位；最后，是走向国际化，走向市场。“从构思到市场”，只有具备了“效率、优先及合理化、卓越”三方面因素，才能更好地应对社会挑战。此外，2012 年，西班牙依照《科学、技术和创新法》的相关内容，相继成立了西班牙国家调查机构、西班牙科技与创新政策理事会和西班牙科技与创新咨询理事会，为西班牙的研发与创新提供了系统完善的管理与支撑。

结构及目标。在西班牙研发与创新战略的结构中，总体目标是要进一步强化西班牙的研发体系，包括：研发领域的卓越和领先，人才和就业，产业领先，作用于社会挑战的研发等。具体做法包括：一是加强机构，保持基础研究设施的可持续性和实用性，推广尖端知识和推广新兴技术，来实现科技领域的卓越和领先。二是在人才和就业方面，深入研究行业的流动与发展，加强研发方面的培训和教育，合理配置人力资源。三是支持工业研发，支持面向市场的研发活动，支持关键促成技术来保持产业领先。四是在健康、食品安全、能源、运输、气候变化、社会创新、经济与数字社会、安全等领域加强研发创新，以更好地应对社会挑战。

内容与计划。欧盟发布的《展望 2020：欧盟研发与创新框架方案（2014—2020）》，主要包含了社会挑战、卓越性、产业领先三个方面的内容。西班牙发布的《西班牙科技与创新战略（2013—2020）》，则包含社会挑战、卓越性、产业领先以及人才和就业四个方面，并制定了相应的国家研发创新计划。一是应对社会挑战的国家研发创新计划，包括：健康、人口变化和福利；食品安全和质量；可持续性的农业生产活动，自然资源，海洋和海事研究；安全、有效而清洁的能源；可持续的综合智能交通；关于气候变化和有效利用资源和原材料的行动；社会变革和创新；数字经济和社会；安全、保卫和国防。二是保持卓越性的国家科技促进计划，包括：国家知识生成子计划、国家发展新兴技术子计划、国家机构加强子计划、国家科技基础设施子计划。三是保持国家研发创新领先地位的计划，包括：国家企业研发与创新子计划、国家发展应用技术子计划、国家针对生产需要的合作性研发与创新子计划。四是国家促进人才开发和就业计划，包括：国家研发创新培训子计划、国家流动性子计划，以及国家加盟子计划。

行动纲领。为提高生产竞争力，西班牙 2012 年开始实施“支持创新和竞争力”行动纲领，具体包括四项计划。一是扶持科技园区的“INNPLANTA 2012 计划”。预算投资约 1.5 亿欧元，扶持科技园区内公私部门建立与完善基础设施和实验设备，由欧洲地区发展基金（ERDF）为公私部门提供贷款或偿还贷款，8 年还款期限，利息补贴高达 75%，最长付息期为 3 年。二是支持技术研发的“INNCORPORA 2012 计划”。投资 9120 万欧元，为公私部门、技术中心和商业协会等机构的专业技术人员提供补助金，进行技术研发、可行性研究；同时也作为培训补助，支持专业人士进行与研发项目相关的培训学习。三是建立技术平台的“INNFLUYE 2012 计划”。西班牙现已建立 40 个公私部门间的技术平台，通过技术平台来选择某领域所需的中长期优先技术，采取“产业分析—制定愿景和路线图—平台间协同合作—最终定位”的流程。四是促进合作的“INNPACTO2012 计划”。投资 8.517 亿欧元，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确定招标项目，鼓励公私机构间开展合作，联手进行研发创新活动，在生产部门与科研体系之间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